

史學的方法、技術和危機

劉子健

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

史學方法，原是朋友建議的題目。個人對這題目，最初沒有多大興趣。可是經過苦思，認為可以就回顧與前瞻，提些看法。

環顧近年來海內外的國史，好像有兩種相反的趨勢。一方面，討論方法的風氣很盛。不但若干學人熱心的尋求新方法，還有專門研討方法的學術集會。不但許多學報上出現了這類文章，有的地方還刊行史學史研究的期刊，每期都有好幾篇講方法。

不過討論來，討論去，對於實際的研究，究竟有多大幫助？應用新方法的成果，又在那裡？縱然在方法上各顯神通，這八仙都真過了海嗎？

另一方面，思想史的研究，風行一時，的確出了些引人入勝的著作。可是畢竟是以思想為主，不以歷史為重。研究以概念做中心，加以分析，又聯結古今中外的精妙異同。不必多用史學方法，而能上通玄機。這倒不是「無法無天」。實在是比較析理學。嚴格的說，不是普通所謂史學。

在這兩種趨勢動盪之下，史學方法又從何談起？更何況史學方法本身不免庸俗平凡。

看看書架上中外論史學方法的書，有時竟昏昏欲睡。內容較好的

，也常重複一些老生常談，那能使青年發生興趣，嚮往史學？就是有興趣，也不易感到滿足。因為這些書好像名廚的菜譜，並沒有開筵享客。

簡單的說，許多書無非是教學生應當把握參考工具，小心考證史料，力求精細分析，達成綜合結論，最好是配合適當史觀。除了這些，史學方法——不但現在，而且在可知的將來——實卑之無甚高論。

這是為什麼呢？歷史是各種範圍的綜合科學。因為各種範圍性質不同，除了處理史料的基本原則以外，不見得有多少共同的方法。例如治經濟史的人，和治美術史的朋友，只能各奔前程。就是治古史和治近代史，也往往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古史細研古物古籍，而近代史得從官書檔案到野史逸聞廣搜衆說。其他範圍的歷史，概可類推。

歷史尋求綜合。從前盛行包羅萬象的這個史觀，那個歷史哲學。用宏觀的假說演繹出來的架構，居然把大段歷史用公式一刀切，自詡可以解釋所有事物。二次大戰後，只有少數盲目的學人，爲了政治信仰，還在胡說。絕大多數忠實於職業的歷史學人，絕不如此。有的是看到幾分，就綜合幾分。既非綜合全盤，也不堅執己見。有的受其他學科的啓發，找新路子綜合。

較新的綜合方法在海外有些好的例子。可是對於國史，未必合用。這裡只舉三項爲例。第一是年鑑學派。在十幾年前，聲勢奪人，目空一切。它是綜合各種社會調查演變出來的。主張認識社會，必需得其全貌。所以要收集一年之內民間所有的資料，加以排比。有時可以用計算機，發現意想不到的關連。或此起彼伏，或迭相催動，或有衝突，或生枝節變化。其中各式各樣的情景，才是真正的歷史。不幸，雷聲大，雨點小。花了莫大的人力財力，才覺悟這所謂全貌，好像一團亂糟。找到一些關連，而無從判明其所以然，又無關鴻旨。換言之

，彙集年鑑，得不到分析線索。

這新法不適用於中國。古史，除了考古發現之外，不用說了。就是近代，因為變亂相循，資料散失，社會調查，也不易進行。追尋全貌，大可不必。能把握大體上的眉目，也就不錯了。

第二種新法是量化學派，以數字統計來綜合散在各方面的資料。這也是限於工業化的現代社會，才有大量的各種數字。以少數的數字列表，不能算統計。統計學要能利用部分的數字，經過公式的推纂，曲線拋影，藉以測定沒有材料的部分。這樣才可以取得一個整個的了解。例如食衣住，各種的食品，各樣的穿著，各級的房屋，按地區分，按職業分，按價格上落分，按季節差別分等等，統計可以用數量顯示這社會的基本生活條件和分配。

這法子行得通的。國史一時雖然不能採用，只是因為手頭缺少數字而已。儘管如此，史學和社會調查的綜合一定有前途。也可以說，社會調查做橫切面，史學去分析時間的縱面。

第三個例子是心理學派，把心理和行爲綜合起來。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，無人不知。他是怎樣一個人，許多史籍上也略有描述，但多語焉不詳。他是什麼個性，基於怎樣的感受，產生什麼樣的動機，於是採取了某種態度，某種行動，某種言論，更是無從深悉。歷史本難求全。但是有位學者起而解答。他本來是醫學博士，心理分析專家，近年轉攻歷史。他把所有馬丁路德的史料，當成心理診察的紀錄，細加分析。果然推定新觀。這書一出，轟動一時。唸歷史的人，都得刮目相待。研究成功以後，這位教授又用同樣的綜合法，研究甘地。可是結果令人失望，反為盛名之累。為什麼呢？西方的心理分析，不適合於東方人。

國史人物，很少有可靠的私生活資料。幼年感受，家庭關係，夫

婦感情，都認為不登大雅之堂。就是有了這種資料——親戚故舊在茶餘酒後所透露的線索——也還需等待中國文化自己產生對中國人心理的分析架構。

介紹這三項較新的綜合途徑，已經看出，史學既然是綜合性的，最好結合一些其他的學科，至少具備一些有關的知識，倒不必惑於新奇。

古人一直在講，貴精貴博。近年很流行的書，論史學方法，繼續高唱，要專精，要博通。假定不進一步加上實用的定義，又與空談何異？馬兒怎樣好，怎樣可以少吃草，要指點清楚才行。

精是指歷史本身。專精是說歷史太大太多，治史的人最好選擇某一時代，再進而選擇某些方面。用了工夫之後，再確定走那些門徑。不過，走到專線上，不要疏忽了大的背景。從大的發現小的，從小的再反顧大的。宏觀微觀，「小大由之」，交相為用。

博是指其他學科。史學方法一向稱之謂輔助科學。這名稱似嫌唯我獨尊，等閒視他。客觀來說，不如改稱為相關科學。相互有關，相得益彰。

但是科學多了，博到那裡為止？這必需說明。以大學生論，很缺乏兩門綜合的課。一門是社會科學導論，一門是人文科學概說。既然沒有這種課，只好自己補充。如果方便，選修或傍聽一些自己有興趣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。看機會多找找這些學系的同學談談，借借書，借借筆記。為什麼大學要把不同系別的同学，放在一個校園裡呢？目的就在同學互學。有時間去圖書館，跑跑書店。無非想了解每一種科學，大致用些什麼概念，經過什麼方法，怎樣從分析過程得到知識。

大學裡取些各科「入門」的知識，看來是十八件武器，件件稀鬆

平常。實際上是極重要的基礎。入了門，才有能力和各種專家接觸，會問有道理的問題，能領會他們的指點。經過這樣的接觸，加上自修，自然更博。附帶一句話，普通所謂博士，其實譯名歪曲，往往專而狹，並不博。

假定進研究所或大學工作，倒另有困難。許多研究所，甚至大學的學系，和其他學術單位，並不相往來。自己的學問儘管精益求精，可是談不上博。雖然如此，也能挽救。一是升堂入室。已經有了大學裡的入門，再就自己研究的題目，去摸索相關科學的門檻，儘量往裡走。二是急來抱佛脚，找人請教。誰是佛呢？可能是老同學，可能是附近大學的教授。再不濟，也還可以遠道通信求教。學本來要問，爲學問而請教人，並不損傷自己的體面。孔子並不在乎，他說三人行，必有吾師焉。

最理想是串連研究。西方早就提倡，日本也漸仿行。主要在科技方面，但歷史界和其他社會科也慢慢採用。定個大題目，從各方面去分析。一般叫科際討論，交叉研究。除了虛有其名的博士之外，沒有任何學者，真是十分的博。群策群力，分工合作，才能達成集體的博。

不管多精多博，都是相對的。先決條件還是要以題目或問題做中心。有的用簡單的方法就夠了，例如敘事，紀傳，本末等等。有的比較複雜，例如某個時代某個區域的精英分子。表面上看來這題目也很普遍。分析起來，因素很繁複。他們的政治權勢，社會昇降，經濟安排，個人態度。這些因素有相互關連，而同時又牽涉到他們的教育，思想，文學修養，道德標準等等許多別的因素。

因此有人說，史無定法。這句話沒說清楚。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，當然不可能有呆板一成不變的方法。其實是史採佳法。說得更清楚

一點，門道很多，因題制宜。

再大膽一點說，因問求法。這不是佛教徒求法。假定說提的問題，一時沒有現成的方法可以採用，怎麼辦呢？答案是去找去，試用各種途徑去尋求。科學家做實驗就是這樣的左試右試，就可能走出一條路來。

有人懷疑，以為應當方法在先，問題在後。事實上這懷疑錯了。人餓了，去找食物。不是有了食物，再問飢餓是什麼感覺。傳說中神農嚐百草，姑不論真假如何，他一定是先發覺一些健康問題，才會費事去嚐。

這話可能說得過頭。只是希望強調一下，題目或問題的關鍵性。這「問」字尤其要緊。中國語文把學和問兩個字連結起來，極為精妙。他種文字不能比美。《論語》裡滿篇是問，歐陽修的《易童子問》，朱喜的《四書或問》，乃至張之洞的《書目答問》，都在問。如果只是傳習，待訪，補遺，拾闕等等，而不發問，那怕用功日知，也不會有新生的學術，激發新的思路，去尋求新的方法。

當然在普通情形下，多半的問題，按照性質可以用現成的方法解決。而在選擇問題的時候，最好是找「中層」題目。

所謂中層題目，原是一位社會學元老指示的方針。大問題龐鉅複雜，既難照顧首尾，也難早日完工。窄而深的研究，固然可以表現學力深邃，畢竟意義不大。下了苦工，收穫有限。用成語來說，大題小做，未免可惜。小題大作，那又何必？用心選題，自會找到中層的問題，既可以從大處著想，又不會困於細瑣。

所謂中層，並非硬性的。隨著研究興趣，可以彈性的調節，時而稍大，時而略縮。做中層題目的時候，容易有小題目的副產品。累積起來，也就看出大方向。另一方面，一個中層觸發到另一個中層，別

開生面。多做幾層，豈非面面俱到？然後更上一層樓，必窮千里目。居高臨下，宏觀在望。

* * *

討論半天方法，總不痛快。雖然提出些見解，還是在原則裡繞圈子，跡近空話。不如借此機會，往實際應用方面談談。不能算是方法，只是技術。方法是高級的，技術是次等的，僅不過附屬於方法的匠藝。

實際應用，只能就個人經驗說。而經驗談卻不免有自誇的嫌疑。所以先要聲明一下，自己半路出家，一向在海外做教書匠，教的又多半是普通課，有時還越出國史的範圍。既無多少餘暇，也難得碰見學侶。做點宋史研究，倒送掉大好歲月。做的題目，也只限於少數幾方面，成就不多。要報告的一些技術，無非是獨學，自己摸索出來的一點點。不過，正因為如此，也許暗合胡適先生說的，但開風氣。

這些技術，本就無名，也無以名之。只是爲了歸納方便，姑妄以綽號名之。借用《三字經》的句法，兼博讀者一笑。

(一)設分類 科學觀察自然界，常先區分類別，尤以生物學爲然。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，何嘗不可仿行？但是有一大區別，自然科學的分類，根據純客觀的標準。而歷史上的分類，雖然引用客觀史實，主要是提出一種觀點或角度，並非純客觀的。所以只能說設分類，而不是定分類。採另一觀點，當然還會有其他的分法和類別，無需強同。

還有一層大區別。自然界的東西，不常變型。而人事卻時有變化。例如把北宋晚期的大臣，分爲各類以後，就看到舊日有理想的幹才，在失去理想之後，就可能有的退爲因循，有的進而弄權。歷來國史上，君子小人硬性的二分法，一經論定，抹殺曲折，顯然不能充分解釋。

這例子太小了。較大的嘗試，是把整個宋代名儒拿來分類。《宋元學案》，只管思想流派，不注意許多思想家的政治主張如何不同。而在政治史上，又忽略了大臣們的學術背景，如何影響到他們的政治作風。設一個分類法，把這兩方面合起來，立刻就導致一些新的看法。最要緊的收穫是王安石和朱熹的比較。王安石批評時政，要用政府力量來一道德。朱熹對時政和社會風氣也極不滿意，希望朝廷和社會都能正心誠意，實踐正宗理學。換言之，兩人都是一元論，要全盤改革。北宋諸儒，原本抱有兼存並蓄的風度。換言之，接受多元。但是王朱所代表的趨勢，加上其他因素，使中國思想逐漸走進長期一元化的格局。幾百年來，新思想很難出頭。

這看法略備一說，可能很多爭論。另外一題，較為平實。如眾周知，儒將是中國文化的特產，卻很少有人研究。假定去分類，就可以看出張良諸葛亮等人只是軍師類。到魏晉六朝才出現杜預這樣的準儒將。不過同時代的貴族將領，大多統率部曲，並不是職業性的。唐代漸有文官，帶領軍隊。大批儒將的出現在宋代。宋初以後，多半靠這類文臣擔當國防和治安。到了明代更多。可是朝廷和民間用理學式的教條，指摘過苛，時有冤枉的攻訐。這就可以了解何以曾國藩李鴻章他們，處處提防，不可能另有宏圖。

(二)鑽小縫 前面說的技術，可能大而無當。鑽小縫是不會受到批評的。拿范仲淹做例子吧。張載見他，有志從軍，而范「授」以《中庸》。這授字是什麼意思？難道張載還沒唸通書嗎？不是的，而是范在發揮他對整個《中庸》的見解。同時，《中庸》有象徵的意義：軍事政治不是基本，匡世濟時需要學者。從哲理上另開新風氣。決不限於《中庸》一冊書而已。

另一個例子更小。范仲淹先天下憂樂的名句，出於〈岳陽樓記〉

。可是范並沒有去岳陽，只用他豐富的想像力，表達氣度。那時候，他已經失權外調。但他屢經貶斥，從不氣餒。在他晚年，改革已經無望的情景下，仍然以雄偉的氣度，高呼以天下爲己任的口號。一般以爲這是他平日的信條，看錯了。更要緊的是，這話流傳，也是從南宋才盛。

(三)顧大勢 做小題目也該連上大勢，而有的大勢常被忽略。例如女真是第一個外族軍隊跨過長江的，豈不該發揮一下這意義？女真兵不夠，無從佔據長江南岸。而劉豫的僞軍又不足取勝。可見外族南下，還得靠漢人軍隊。這一大端，又可另加發揮。例如元代得江南，主要靠襄樊戰後的降將，其至投降的長江水師。清代入關，有三藩相助。這歷史還和對日抗戰有關。日軍扶植的僞軍，未忘民族大義，不肯替日寇拼命。連訓練了十幾年的僞滿軍隊，一夜之間，蹤影全無。換言之，日本人，尤其是那批所謂御用學者，研究了多少年征服王朝，根本沒懂得大道理。沒有內奸反叛，中國民族是不能征服的。

(四)抓要點 題目太大，該先從要點著手。許多人搞改革家王安石和保守派領袖司馬光。可是在他們之前，還有要點。改革有它的前驅，那就是范仲淹他們一度主政，想要實施的慶曆變法。這所謂變法，主要只在行政方面。前因後果，也較簡單，容易把握。而拿這前例作比較，就更了解王安石新政的成敗。

夾在中間的有歐陽修和韓琦。最初他們是慶曆變法的要角。到了老年，他們又拒絕執行王安石的新政。研究他們一下，就會明白北宋中期的士大夫，不是只分新法和保守兩邊。蘇軾蘇轍兄弟，同樣值得注意。小蘇原本參加起草新法，轉而反對。大蘇雖然反對新法，但日後路過金陵的時候，特意去拜訪退隱已久的王安石。對於堅決保守的司馬光，他一度生氣，叫他司馬牛。這些要點都饒有興趣。

(五)搶一角 如果好些人已經在做同一的大題目，也可以用下圍棋的方法，先搶一角。王安石新法，又是好例子。有人搞雇役，有人搞保甲，有人搞市易。如果避開這些經濟軍事方面，可以研究法律，行政，或吏治。也可以避開中央政府。有一位美國友人就在研究在新政時期的四川。另一位美國學人只做新政下江南的農田水利。

(六)找邊傍 下圍棋搶不著角，怎麼辦？從邊傍去下手，未始非計。例如，衆所週知，南宋權相史彌遠，在位最久，一共卅六年。可是史料很少。官家紀錄，受到他的控制。繼任的原是他舊屬，仍舊控制。南宋不久就陷入危局，私家也很少治史。不過，寧波史氏有族譜。寫政治史不夠，但寫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昇降，豈非異曲同工？另一位美國學人，不但寫了，還出了書。

秦檜更是遺臭萬年，而史料很少。據說他暗通金人，可是怎樣通法呢？沒有密碼電報，只好派人送信。何以這類事始終不走漏消息，當時沒人察覺，事後也沒傳聞。南宋著書譴責秦檜的人，竟掀不著一點證據。證據還是有的，從他身邊去找。查他親戚之中，果然發現暗通消息的是他的表弟鄭億年。他在劉豫那裡做僞官，知道金人動靜。家人來往，自然不露形跡。議和之後，鄭回南宋，高宗還破例特賞高位。金人按照和約，要求引渡，高宗又特別向金人求情，留他下來，免得洩漏以往暗通的機密。

(七)出冷門 圍棋下不好，一角和邊傍都搶不著。在無法之中，還可以找點冷門，無人注意的題目。所謂冷，指冷落，並不是無關鴻旨。所謂門，指通達，從那題目可以連接到不太冷的地方。也許馬球是適當的例子。從若干史料，看到唐代上層，盛行馬球。宋代呢？同時的遼金和高麗怎樣呢？最初以為這冷門難找資料。沒想到一經注意，是隨手碰到。

馬球自唐以及五代以後，在宋遼金高麗各國，都大趨衰落。南宋尤其顯著。金國雖然是游牧背景，朝廷裡也反對馬球。因為在這些國家裡，都是文治抬頭，厭惡激烈遊戲。在文治之中，非世襲的職業文官，提倡文風的娛樂，指摘馬球是不正經的貴族玩意兒。可是文風裡有合理的體育嗎？這冷門就引出另外一個熱門的好題：體育史。

(八)碰運氣 有時治史好像大海撈針，不知道解答在那裡。可是想到問題，不要忘記。放在一邊，可能日後碰上。《三字經》這書是傳統普及教育的主幹。託名宋末王應麟編的。真正著者是誰，無從查考。但是可以推想到，從習慣的四個字一句，改為容易上口的三個字一句，在南宋可能已經出現。可是沒有找到，也不知從何找起。事隔十幾年，偶而在陳焯的集子裡發現了。爲了教他幼子，三個字比四個字容易學，他就編了一套。拿來一比，三字經顯然是模仿他的先例。

想問題，提問題，以多取勝。按照數學的或然率，多了就多會碰上好運氣。

(九)求概念 以上所提的技術，有些關於做法，多數關於找題目。然而歷史還有較大的目標，要從繁瑣的史實中，抽取精髓。要從駁雜的時代中，把握關鍵。這話好像奢望，但也無須見怯。概念，也和分類一樣，是假設的。所謂概，是就其大概而言之。從整體方面，大略的觀察。所謂念，是治史者的理念。概念雖然儘量解釋多量的史實，但它並不存在史實之中，並不是純客觀的。

再進一步說，有人提出這樣的概念，另一位可能用不同的假設，第三第四人也許別有觀察。豈非衆說紛紜，信史何在？這關鍵全看方法論上贊成一元論？還是多元論？歷史有許多複雜相互交叉的因素。在多數情況，恐怕不是一元的解釋所能盡致。信史只是指史實而言，不指解釋。解釋只看可信度，有的較可信，有的尚待修正。

就算解釋的終極，歸於一元，在發現終極的過程中，何妨先設多元，相互參證？自然科學向不反對從多方面來做試驗，用不同的概念，作不同的測定。請看物理學，幾十年來分頭研究，各有貢獻，誰又先從頭咬定終極的一元？

所以，歷史努力求概念，務須保持兼存的風度。技術方面呢？只要聲明概念是從史實歸納，試作抽象的推測，並不是確切的定論，想來不致於受到猛烈的惡評。

舉兩個大膽的例子。從史實裡看到南宋政治，儘量避免激烈的措置，儘量調處不同的勢力、相反的意見。政治學上常講統治，控制，高壓等等方式。可是是不是在威脅利誘之外，還有另一種手段去維持政權？有的，軟性的妥協。古話叫恩威並用，現代話叫交換條件。使反對派在大的爭端上讓步，而同時在另外方面滿足他們，補償他們。這種作風，姑名之曰包容政治，寫進大英百科全書。雖然這概念並不流行，至少也沒蒙受打擊。

概念又有什麼用呢？包容政治不但可以解釋南宋朝政，也能說明自南宋至民國，官官相護，官官相包容的情況。不僅官場，它還能幫助了解地方鄉里，走馬燈的縣官和盤踞衙門的胥吏之間的關係。何以胥吏不爲己甚，可以託人疏通，也是這緣故。換言之，包容政治，起於南宋，直到近代，從上到下，普遍採受。人情世故，也就是通曉這關係。

另外一項概念更大。先進學人從經濟看，以爲宋代是新時期的開始。別的史學權威，從階層看，從貴族領導變到以士大夫爲主幹，宋代更代表新時期。假定從文化整體來看，宋代的確和以往的傳統頗有差別。但是，前面所提到的概念並沒解釋何以宋代的模式，幾乎近千年而大致不變。也許可以另加一個概念，叫新傳統時代。

，當然有好些外在原因，這裡不必細說。可是有一部份，也是史學本身造成的。說歷史有用，往往近乎自我宣傳，不常兌現。事實上，史學研究離開大眾，離開現實太遠，並不常顧及一般人的興趣，怎會對他們有用？

最明顯的遺憾就是在方法上過於重視窄而深的研究。青年學人如果放手寫較大的題目，當然一時寫不周全，還可能有點小錯，立刻就會受到年長人的責備。沒有全搞清楚，怎能胡亂做這種大題目？責備之後，當然會影響到待遇和前途。爲了明哲保身，只好埋頭苦幹，深鑽窄題。

打開史學期刊一看，果然又精又細。滿篇都是史料，後面一大片的註。嚴謹到水洩不通，傍人無能贊一辭。可惜內容未必能引起同行的興趣，更不用說外人了。而負責領導的兩三位長者，倒可能嘉許。認爲確實下了工夫，做得很結實。假定這時有個不知趣的外行，隨便開個玩笑問道，水井也是窄而深的，那末坐井觀天，算不算窄而深的工夫？大家一定回罵，說這種人太無知了，根本不懂學問。既然他不懂，他的問題也就免予答覆。

司馬光大概懂得學問的。他編《資治通鑑》，遇見有史料不一致的情形，無法解決，就另立一條考異，附正文後面。假定採用窄而深的標準，他應當爲每條都去做一番考據。先在學報上發表，要等這些考據都做完，才有出版《資治通鑑》的資格。這合理嗎？

史學方法並沒有說過，不許做寬的題目，也並沒有鼓勵大家多作無關宏旨的窄題目。換言之，窄而深的研究，至多是一格，並非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。青年學人發展其他途徑是應有的權利。

史學方法更進一步應當說明，研究是且戰且思，經過嘗試，才有拓展。只標榜窄而深的研究，不肯嘗試傍的做法，等於是違反科學精

神。

史學界作風的缺陷，不僅於此。開學會宣讀論文，刊行一本著作，都是單獨作戰，很少聯手。史學方法的書，好像都是按照二次大戰前的行情寫的，已經落伍了半世紀，因為從不提及合作研究，集體討論編書。現代合作研究不僅是分工，各做一部份而已。最好是澈頭澈尾合作，一起計劃，一起討論共同認為重要的問題，彼此交換資料，彼此徵求意見。在這過程中，時有改變，走新方向，採用新觀點，推進行新分析。這都不是一個人埋頭苦幹所能豁然貫通的。集體討論編書過程較為簡捷。定一個大題目，各人分題寫一篇，然後把所有各篇的未定稿分發給每個人。先看了，再聚在一起開幾天的會。每篇稿子都在會上討論。先由輪流的評論員發言，然後大家都可以發言。贊成，反對，修正補充，批評保留，都可以。會後，請原著者參考會場上的意見，再寫成定稿。中國老話叫以文會友，集思廣益。西方現代已經把這種話制度化了。

假定合作多，集體討論多，史學一定活潑起來，往寬的題目走，多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興趣和支持。歷史無用論自會過去，歷史有用論有希望抬頭。

討論的風氣，風度和習慣，在中學大學裡，就需要培養。孔子就用問答式討論，顏淵和子路的意見常不相同。在這方面，現代的教學法，倒比上古退了一大步，不應該反省嗎？再引一句古語，教學相長。試問師生之間不討論，怎會相長？如果能添教新課，刺激興趣，學生在指導下收集更多的參考教材，更好。所以史學方法的書，應當進一步的強調，與同行合作和討論的重要，善用教學以增長自己的學力。

這樣提倡還不夠挽救史學危機。因為這危機散佈在全社會。學校

和研究所都是象牙高塔，不是中流砥柱。應該從學術基地向外放射。

以書籍而論，最好有課外讀物。一般讀物，包括歷史故事，歷史小說在內。例如高陽先生的作品，就對史學興趣大有裨益。重要標準還不是有多少史實，有多少準確性——這當然要考慮到——而是能否引起多數人對歷史本身，也就是說其他更多的歷史，更多的求知慾。

還可以向生活的各方面開拓。衣食住行，烹調服飾，茶酒水果，建築園藝，琴棋花鳥，不都可以寫有歷史興趣的書嗎？人們對生活關心，就會欣賞這些文字。換言之，生活有歷史，歷史該走到生活裡。

就是比較枯燥，講史學方法的書，也未嘗不可以找文筆好，想像力豐富的作家，用故事，或者設問的方式，寫出些有趣味的作品。

書還不夠。同樣的內容可以由無線電播送，上電視銀幕，甚至拍成合乎歷史教育原則的電影。現代社會以大衆傳播為動力。各種媒介，都該利用。

然而視聽廣播的效用，不一定勝過文字。因為廣播只是一時一次，稍縱即逝，無從復習。如果大衆都錄音錄像，那就太費了。

定期的大衆讀物，收效最廣。可以反覆的細看，可以在上面註字劃道，可以養成常看的興趣，可以和人談論，可以借讀流傳。近來創辦的《歷史月刊》，內容豐富，並且避免窄而深的寫法，目標指向一般讀者。這顯然是進步。如果再進一步，可以考慮往報紙上去，因為看報的人更多。當然不必每天講歷史，每週一版副刊的方式最相宜。在報紙說，多一種格調，多調劑興趣。在史學呢，幫助衝破危機。雙方有利，大可合手。何況早有先例——有名的《大公報》，曾經有〈史地周刊〉。

總上而言，史學方法針對危機，最好能著力主張，提高學術論著的品質，並且要擴展陣容，多採取現代式的寫法，面向大衆，走向社

會。先是激發同行之中彼此的呼應，進而促進一般讀者的興趣。

還漏了一方面，特意留在這裡強調一下，就是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之間的關係。他們是專行的，史學是綜合的。他們有系統化的概念，原理，方法，技術，常能集中分析，絲絲入扣。史學大可參考。但是他們也未必能放諸四海而皆準，因為社會有多方面，文化的性質每不盡同，古今中外時或相異。歷史可以幫助他們，提供若干個案。兩方面互有短長。聯繫起來，左右逢源。所以希望歷史產品，多爭取這些學科的讀者。也要求這些專科的學人，多寫含有歷史興趣的寫作。

走筆直言，滿紙芻議。有的恐怕錯誤，有的會貽笑大方。就是偶有一得，也未必能被採納。幸蒙採納，又未必能辦得通。那末，說了半天，所為何來？

最大的願望是振興史學界的士氣，從講史學方法，發展切實的歷史研究法自助助人。